

《马藏》编纂注重思想过程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藏》主编顾海良

《马藏》是对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相关文献的汇集与编纂,旨在通过对文献的系统整理及文本的再呈现,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世界传播与发展的相关文献集大成地编纂荟萃为一体。2015年初,《马藏》工程正式启动,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到2018年,《马藏》中国编第一部1-5卷已经正式出版,《马藏》研究第一辑也同时出版,6-10卷将在2019年内出版。

作为一项重大的基础性学术文化工程,编纂《马藏》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学的学理研究和学术探讨、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马藏》对于促进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对于全景式地展现中国近代史也有着重要意义。

《马藏》编纂以思想性和学术性为标格,坚持用真实完备的文本理路再现历史,特别是思想历史;坚持尊重历史、细致纂修,精密诠释、求真拓新、全面筹划、系统编排;坚持思想性和学术性的有机结合,力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实践过程和思想过程作出系统探索。

《马藏》编纂不同于一般的典籍集成,注重的是思想过程,在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本理路中,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路标”或“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的思想历史基础。注重思想过程,因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思想的意义不只在既成思想的集合,还在于思想历史过程的集合。在思想的历史过程中,才能映现思想的实践影响力、理论感召力和社会推动力。

思想的“历史路标”则是思想过程的转折点,是由社会历史巨大变化或思想历史重要变化而树起的里程碑。从思想过程上去理解,从“历史路标”上去识别,将更为系统地再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历史,更为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藏》编纂拟分作“中国编”和“世界编”两大系列。现在着手编纂的“中国编”,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的汇集。

《马藏》采取分部结构,共分作4部:第1部为著作(包括译著)类文献;第2部为报刊文章类文献;第3部为各类通讯报道,及各种档案、笔记、书信等文献;第4部为中国共产党有关文件类文献。4部之下,按照思想历史过程分部设卷。2019年出版的是《马藏》第1部第1卷至第5卷,收入的是1894年至1903年间出版的著作、译著类文献,约合360万字。

《马藏》对各文献文本的编纂,分作三大板块。一是文本呈现。为有利于学术研究,凡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相关的有思想价值、学术价值或文本价值的文献,在内容上依照原貌呈现;对同一文献文本有不同版本的,如有思想价值、学术价值或文本价值的,则逐一收录;对不同时间出版的同一种文献和数据,在内容上没有变化或变动较少的,只收录最初版本的文本。二是文本校注。以页下注释的方式,指出原书中的误译、误写或误排,予以更正;对文本中出现的人名、地名、著述、历史事件、组织机构和报刊等名词给予准确而简明的说明。三是文本述评。以“编者说明”的方式附于相应文本之后,呈现编者对该文本的述评,“编者说明”对该文本形成和流变情况作出描述。如介绍文本原貌及来源、作者、译者、历史背景、出版情况、不同译本和版本演变情况、文中涉及的重要概念和史实、文本传播状况、文本的思想倾向等。“编者说明”也对文本研究状况作出述评,注重对该文本及其主要内容相关的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现状、主要观点和各种评价作出述评,力求对已有研究成果作出思想性和学术性的总体述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在文本选择和文本译译上,作者或者译者的思想倾向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对外来思想文化的介绍中,中国传统的“通变”理念渗透其中。“通变”的意境在于通晓变化之理,讲求应时而动、顺势而为。

《马藏》第1部所编纂的著作,我们按照习惯称作“文献”,但在具体编纂中,更多的是以“文本”对待。在《马藏》编纂中,对各种文献不是从既成的“作品”,而是从“文本”探索意义上加以理解的。“文本”意义上的研究,突出的是对文献的原始文本、文本多种译译本、文本多种版本、文本流转、文本扩展和转呈等方面的研究,这就改变了以往从“作品”的静止的、孤立的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文献研究的方法。

《马藏》编纂不同于一般的典籍集成,注重的是思想的过程。思想的意义不只在既成思想的集合,还在于思想历史过程的集合。在思想的历史过程中,才能映现思想的实践影响力、理论感召力和社会推动力。

《马藏》首发

厘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发展

■本报记者 韩天琪



《马藏》第一部第一卷

在文本选择上,结合清末中国的国情及社会现状,以“文以载道”的强烈意愿,力图在“传道”中“悟道”、在“悟道”中“行道”。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知识界开始译介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著述,中国人也开始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学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开端。当时的一批知识分子,怀揣着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愿望,到处寻求真理。这一时期,日本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已经有了更多关注和理解,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著述。留日学生和旅日学人在日本接触到这些著述,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为向中国国内传播这些思想,他们积极而迫切地选择其中的一部分著述译介到国内。在译介过程中,几乎所有知识界学人都依循“文以载道”的理念,结合清末中国的国情及社会现状,以“载道”的强烈意愿,有意识地选择自己所赞赏的思想主张和种种“主义”,落实相关文本,力图在“传道”中“悟道”、在“行道”中“行道”。

在文本译译的“互文性”上,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文本思想生成和文本转呈的特征。《马藏》突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文献的“文本”意义上的研究,由此必然生成文本研究中“互文本”和“互文性”的问题,这里讲的“互文性”,指的是“文本”与其他文本,文本及其身份、意义、主题以及社会历史之间的相互联系与转化之关系和过程。在“互文性”意义上,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文本思想生成和文本转呈的特征和意义。

《马藏》的文献价值、学术价值、学科价值与思政育人价值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于鸿君

我们把《马藏》工程定位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大基础性学术文化工程。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收集和出版一直受到学术界的肯定,但学术界始终未能把与马克思主义发展有关的文献集大成地编纂为一体,这不能不满足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需要,也不能满足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学派和话语体系的需要。因此,启动马克思主义文献编纂工程,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推动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具有重大且深远的意义。

《马藏》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传播过程中相关文献的汇编,而文献的汇集和整理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史上出现的重要理论和学派都以文献研究为依托。

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关文献的出版,促进了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形成。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1907年起在欧洲整理了大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为1921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成立打下了基础,研究院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文献资料的大规模收集购买活动,又为1924年筹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打下了坚实基础。有的国家相关研究所因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和国际工人运动文献的丰富与收藏成为世界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思想圣地。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相关学科的恢复和建立,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研究取得长足进展。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建立时间不长,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料的系统汇集和整理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有价值的成果比较少见。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接受的文献史的系统编纂仍待建设。

这一缺陷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特别是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二级学科建设形成了很大制约。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思潮涌入中国,在思想交锋中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想逐渐在各种思潮中脱颖而出,在这个过程中,先辈知识分子留下了大量文献。国外一些学术单位把文献整理看做学术

工作,这项工作会耗费很多人力、财力、物力。其成果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基础性资料。然而受各种条件制约,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一般不太重视文献的收集整理。

目前对这个领域资料收集仍然不系统、不完整,表现为许多散落各地的珍贵文献未被发现,或者发现线索由于收藏地管委会的限制等原因,文献获取困难,还有的文本散落在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和海外(包括日本、美国、欧洲一些国家),这就增加了文献研究的难度,造成以往的研究往往由于资料不足,或者未见到原本而难以开展。

在研究中,除了文献资料获取的问题外,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上也出现了一些亟待创新的问题,例如概念史、观念史、文献学等研究方法还没有用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领域,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因此受到限制。

《马藏》的出版让未被发现的文献得以面世,将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解读,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范式和方法。

《马藏》的开拓性不止于文献价值和知识价值,还有学术价值、学科价值、思政育人价值。关于学术价值,《马藏》的特点是突出学术性、权威性、编纂原则创新性。在研究中,我们将结合翻译史、传播史和接受史等研究方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知识界探索中国富强、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以严谨科学的精神进行研究,在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层面提升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水平,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和研究范式,引导国际学术界的讨论。

《马藏》是一项多学科综合史学工程。《马藏》的编纂出版将展现真实而客观的中国现状,揭示中国人民如何选择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执着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时代化,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以及马克思主义传播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学科研究方向的拓展具有重大意义。

目前,国内学界限于史料不足,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些错误的观点。例如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

义传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完全是共产国际策划的结果,《马藏》的出版将通过详实的思想史资料和文本证据对此进行有力回应,有助于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

《马藏》编纂和研究工程还有一个宗旨——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相关学科的人才培养。北京大学将通过《马藏》工程,加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相关学科博士生、博士后人才的培养工作,让参与《马藏》编纂和研究工作的年轻一代不断提高学识学养,提升研究能力和研究水平,将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领军人才。

通过《马藏》工程,我们将聚合一大批国内外优秀学者,形成有特色的研究群体,近期目标是形成影响世界的学术流派。下一步要加大吸纳校内外、海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的专家学者。

根据规划,《马藏》将通过20年左右时间完成。动员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全国乃至世界相关领域学术大家加入到编纂工作中,这绝不只是北京大学的工程,而是一个国家级工程,也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发展方面涉及到全人类的一个重大工程。

从目前的阶段性成果看,编纂工作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参与的学者还不够广泛,特别是大学者不够多,希望能够有上百到数百名大学者,特别是从工作岗位退休的学术大家加入到这个工程研究中。下一步我们要启动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收集整理,完成《马藏》的世界编,希望我们的编纂队伍中吸纳进国外的优秀学者。

第二点不足是对《马藏》的研究还不够深入。2018年,《马藏》出版了第一辑,这应该说是组织更多的研究力量来深入进行《马藏》发现的一系列重大目的的研究,在这方面还需积累经验,动员更多的学者参与到《马藏》的研究工作中来。

用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戴运祜

《马藏》具有不可替代的史学价值。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留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文献资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基础,而相关文献的汇总编辑是缺乏的,这使得研究者有一种望洋兴叹、无所适从的感觉。同时,《马藏》对于学界在新时代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具有无可替代的时代价值。2015年和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仪式的致辞中,都讲到历史研究是我们一切研究的基础。《马藏》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可以预期《马藏》的继续推进,越来越多文献的问世,将为我国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

在已经出版的《马藏》第一部第1-5卷当中,编纂者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和必要的注解,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新时代我们要讲清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指导思想,我们要本着最基本的原则,用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马藏》的文献史料将是重要的依据。

《马藏》的出版从结构上改变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发展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宪明

马克思主义学科长期以来有结构性工作,无论引进何种文献,若从其完备程度来看,我国对马克思主义相关全集、选集、专集、文集的引进在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但是这些文献是如何处理的尚不清楚。一些学者做的工作总体来说比较零散,不够系统全面,《马藏》的出版从结构上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发展。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学科发展相当程度上是自发的、参差不齐的。《马藏》的编辑出版将把这个学科提供比较系统的支撑,整体上改进和提高研究水平,为人才培养提供了新模式,为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学术研究开拓了新领域。

期待《马藏》的电子化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陈金龙

《马藏》编纂的指导思想原则是全面性、学术性、思想性、权威性。《马藏》第1部第1卷至第5卷的全面性超出我的预期。1894年至1903年间出版的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相关的著作、译著类文献都收入其中。《马藏》编纂的权威性确实很强,在文本上具有国内相关学科领域的最高权威。

《马藏》的出版为学术研究带来便利。此前学术研究所依据的原始文献主要是影印版,使用不便。《马藏》中收录的文献都经过重新排版,大大提高了文献使用的便利性。未来建议将《马藏》的电子化也纳入《马藏》编纂工作,实现通过搜索关键词直接进行文献检索。

学术速递

栏目主持:韩天琪

徐晓旭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蛮族人”是希腊人对一切非希腊人的统称,是他们建构的与“自我”构成二元对立的“他者”。这是古风时代伊奥尼亚人的一项发明。伊奥尼亚人是在与外族相遇的情境中开始将外族他者化的。希波战争后涌现的各类蛮族意象几乎均属“雅典制造”。希波战争、雅典民主、奴隶制等因素是大量制造蛮族的主要动力。大量制造的结果是,“蛮族人”作为对所有非希腊族群的蔑称,最终为所有希腊人所熟知。

——《创造蛮族:古代希腊人建构他者新探》,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2期

胡振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

文学公共领域是解读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有益视角。启蒙运动一方面是对以人为本的个人主体性的强调,另一方面是对理想社会公共性的期待。启蒙运动的这两个核心要素分别融入18世纪记者文学作品、作品流通、读者阅读的实践之中。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公共性的互动主导了由作者、作品、读者三者参与的实践话语,它们的语言交往行为是公众舆论发展及公共领域形成的依托。作者—作品之间的文本生产关系、作者—读者之间的文学批评关系,这两者的互动成就了公众舆论实践话语,在这种语言交往行为中,文学公共领域得以形成。文学公共领域借助文学实践,即以美学形式呈现的语言交往行为实践,推动民众在表达个人主体性思想的基础上凝练共识,成就社会公共性,实现政治变革。

——《作者、作品、读者:18世纪欧洲文学公共领域的建构》,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02期

马迎辉

南京大学哲学系暨现象学研究所副教授

胡塞尔晚年将两性间的本能和母婴关系等“在家状态”构筑为超越理论现象学的新基础,从而实质性构成了对海德格尔“在世存在”理论的批评:本己性并非“无家可归”的,而是应该显明于与家人关联的“切己性”。同样以“在家”为基础,列维纳斯突破了海德格尔“在世存在”理论的统治,但与胡塞尔强调的“融合存在”不同,列维纳斯坚持亲子与两性中的他异性的基础地位,主体只能在不可消除的差异性中与他者相互渗透、感发与生成。在对在世、在家之奠基关系的转换中,现象学运动实现了从在世存在到本性存在,再到异质存在的突破。

——《家与存在:一项现象学的研究》,载《哲学动态》,2019年03期

杨念群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经世”思想近些年颇受关注,但学界研究也出现了如下问题:一是把“经世”仅仅理解成狭义的日常治国理政行为,而忽略其深层文化根基一面的阐释;二是把“经世”视为明清危机时期改革家推行激进政策的工具,而没有看到趋于保守的政治官僚同样具有经理世事的情怀和能力;三是把“经世”仅仅看作古代王朝遭逢鼎革易代之际发生的思潮,而没有看到处于常态过渡时期的历史同样存在着经世思想并持续发挥着作用。

——《“经世”观念史三题》,载《文史哲》,2019年02期

姚林群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赵鑫凤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生

实现人文社会科学在促进国家经济增长、提升国家竞争力上的作用是加拿大提出“知识动员”的根本目的。教育知识动员利用中介组织在知识生产者 and 使用者之间建立起多层次的多向联结网络,在适应教育知识生产—实践的重叠背景下,实现教育知识的价值延伸。在政府部门支持下,加拿大知识动员借助新媒体技术,建立起知识中介和专业知识共同体以加强教育研究者与教师之间的联系,促进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联结与转化,成为解决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的“良方”。

——《加拿大如何弥合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鸿沟——基于知识动员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载《外国教育研究》,2019年03期